

# 农民工职业流动歧视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李长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本文利用 CHIP 2002 年的数据, 分析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职业流动的不同特点, 以及个人特征对两个群体职业流动的不同影响。和城镇职工相比,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要远远大于城镇居民。运用 BOC 因素分解模型的结果表明, 除了个人特征外, 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流动率全部差异中有高达 86.63% 的部分不可由个人特征解释, 表明歧视性因素是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繁的重要因素。研究还发现, 职业流动对农民工的收入具有正效应。

**关键词:** 农民工; 城镇职工; 职业流动; 歧视; 收入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0) 06-0027-06

##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gainst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Income

LI Chang-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CHIP 2002, the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at of urban worker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impact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on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Compared with urban workers' professional fluidity, migrant workers' must be much bigger. Using the BOC factor decomposition model,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eside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as high as 86.63% of the who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ate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of two groups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it is the prejudice factor that attributes mostly to the frequency of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e research also discovers that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income.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urban workers; occupational mobility; discrimination; income

### 一、职业流动理论述评

职业流动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见现象。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 职业流动要么跟城乡

收稿日期: 2010-12-17; 修订日期: 2010-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07&ZD044); 国家社科基金(10BJY028); 对外经贸大学科研启动基金(09QD11)。

作者简介: 李长安(1969-), 江西南丰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的绝对收入差距有关，要么跟农民进城务工的预期收入有关，抑或是在城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推拉。不过，这些理论更多的是解释了城乡劳动力由农民向城市工人初次职业转换的动机。对于完成初次转换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的职业流动特点及动因则论述不足。

在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的逐渐成熟，企业职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日益突出，由此也产生了一批相关研究。二战后，关于职业流动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劳动者个人的特征方面。布鲁门等人提出了著名的“迁移者—停驻者”模型<sup>[1]</sup>。该模型认为，流动性高低是劳动者的一种内在倾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倾向性。有的人天生喜欢流动，同时这种人生产率不会太高，他们称之为“迁移者”；另一种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则往往会尽量避免发生工作的转换，他们称之为“停驻者”。他们认为，劳动者的这种倾向性与劳动者的个人特征有关，而不会单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对于影响职业流动的个人特征，一般包括：年龄、家庭因素、教育、距离、失业率以及其他因素等。很显然，由于劳动群体的个人特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职业选择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中。

此后，研究者又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对职业流动问题展开了研究，陆续出现了几种比较著名的理论。比如布莱克（Black）和丹（Dan）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sup>[2]</sup>，伯格曼（Bergmann）提出的职业拥挤假说理论<sup>[3]</sup>，多林格（Doeringer）和皮奥里（Piore）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up>[4]</sup>等。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具有不同特征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比如妇女、农民或者外来移民等）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制度性的额外流动成本，所以往往只能转移到职业声望较低的工作岗位，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现象也由此而生。

对于职业流动的收益，绝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农民工的初次流动对收入具有正面的效应。但对已经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工来说，职业流动对收入的影响则是多元的。在国内，许多学者对农民工的初次流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农民工的迁移决策方面，涌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实证研究。李强认为，中国内地的农民工是一个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群体。他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区分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通过对实证调查数据和材料的分析，他证明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sup>[5]</sup>。林坚、葛晓巍对农民初职、现职和未来职业预期变化的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工商劳动者成为农民向高层流动的“中转”职业，尽管农民的流动人数很多，但都集中在声望值较低的职业之间，流动后的社会地位依然不高<sup>[6]</sup>。田艳平、杨云彦运用武汉市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和 2005 年来外人口就业的调查资料，研究了农民工的职业过程及其适应性<sup>[7]</sup>。总的来说，国内的大多数研究均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多的只是横向流动而非垂直流动，不管是对职业声望还是对流动者收入水平，均未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

对于职业流动定义，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麦克南等人将各种职业流动的方式概括为四种：工作改变但职业和居住地未变；职业间流动而不涉及地点变换；地区间流动但不涉及职业的改变；伴随着职业改变的跨地区流动<sup>[8]</sup>。很显然，这是一种广义的定义，因为它涵盖了工作变换、职业流动和跨地区流动的情况。而狭义的定义指的只是工作发生变换的情况，因此，职业流动也可以等同于工作转换的概念。本文所使用的职业流动概念就是狭义的定义。而关于职业流动率的定义，则可以界定为一定时期内职业转换的数量占总就业数量的比重。但在关于时间长短、总就业量所涵盖的范围以及职业转换的具体类型等方面各研究又有所不同。也有一些统计研究分别按照不同的职业转换类型统计不同的转换频率，如劳动者自愿变动的职业流动率、非自愿变动的职业流动率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离职率等。在本文中，职业流动率被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全体成员职业流动的总次数与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受到调查数据的限制，其中城镇居民为调查时间点前

三年的职业流动情况，农民工为在城镇参加工作或就业的职业流动情况。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CHIP），研究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试图揭示出其职业流动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可能受到的非个人特征所能解释的阻碍因素，即歧视性因素，并分析职业流动对不同群体收入带来的影响。

## 二、数据样本的一般描述

下面我们利用 CHIP 2002 年的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情况做一简要描述。这次调查覆盖了北京、陕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 12 个省市，其中城镇住户 6835 户，20632 人；农村流动户 2000 户，5327 人。我们只保留了就业人员，并且剔除了遗漏个人和收入信息的观测对象，最后得到城镇居民样本 10175 个，农民工样本 3331 个。

表 1 一般描述性变量平均值

项目	城镇居民			农民工		
	平均	男性	女性	平均	男性	女性
受教育年限（年）	11.41	11.47	11.35	7.86	8.28	7.44
年龄（岁）	40.35	41.83	38.86	34.61	35.62	33.59
本单位工作时间（年）	14.26	15.86	12.65	5.09	5.42	4.76
本单位工作时间平方	203.72	247.42	160.02	26.02	29.38	22.66
全部工作时间（年）	19.97	21.68	18.26	6.98	7.69	6.27
其他工作经验（年）	5.72	5.82	5.61	1.89	2.27	1.51
其他工作经验平方	32.67	33.87	31.47	3.72	5.15	2.28
职业种类（%）						
私营企业主与个体户	4.71	4.87	4.51	52.88	51.89	54.19
专业技术人员	21.20	20.12	22.56	4.00	5.36	2.18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10.52	15.07	4.84	0.48	0.68	0.21
一般办事人员	20.34	17.75	23.58	2.41	2.89	1.76
工人	28.50	32.62	23.36	6.84	9.36	3.45
商业服务业人员	12.38	7.54	18.43	27.04	23.13	32.28
其他	2.34	2.03	2.73	6.35	6.68	5.92
小时工资（元）	5.73	6.15	5.20	3.16	3.70	2.44
小时工资的对数	1.48	1.57	1.37	0.86	0.99	0.69
样本量	—	5648	4527	—	1905	1426

通过表 1 所列出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一些描述性统计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一些显著差别。在文化程度方面，城镇居民的文化程度明显比农民工要高。城镇居民的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41 年，而农民工的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86 年，后者比前者要少近 4 年。在职业种类方面，两者的分割也较为明显。比如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的职业集中在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上，而城镇居民中的该比例不到 5%；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职业还包括商业服务人员和其他职业；城镇职工则在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一般办事员等职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年龄方面，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年轻，这也符合我们的一般观察。在工龄方面，城镇居民的工龄几乎为农民工的 3 倍，这也反映出城镇居民的工作稳定性要高于农民工。另一方面，如果把其他工作经验定义为到城镇工作时间减去在现单位工作时间，那么农民工的其他工作经验也要明显比城镇居民少。在工资收入方面，正如几乎所有的调查所发现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城镇职工。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受教育年限是各类人群中最低的，其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还不到 2%。在职业分布中，女性农民工最为集中的职业是商业服务人员，为 32.28%。与此

相应，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是最低的。令人吃惊的是，她们的工作时间却是所有群体中最长的。其结果，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的 63.0%、男性农民工的 70.3% 左右。而小时工资只有城镇居民的 42.58%、男性农民工的 65.95% 左右。

表 2 显示的是城镇居民与农民工职业流动率方面的差异。从总的情况看，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要大于城镇居民，农民工的职业转换率大约为城镇居民的 5.7 倍。这充分说明相对于城镇居民较为稳定的职业来讲，农民工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从性别看，男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个农民工的流动次数达到 1.07 次，而城镇男性的流动性最小；从企业所有制来看，非国有企业的流动率要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的流动率；城镇居民在非国有企业的职业流动率要远高于国有企业，而且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农民工的流动性都比较大；城镇居民在非固定工作的流动率要显著高于固定工作的流动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在固定工作的流动率还要略高于非固定工作的流动率。

表 2 城镇居民和农民工职业流动率

项目	城镇居民			农民工		
	流动次数 (次)	总就业数量 (人)	职业流动率 (%)	流动次数 (次)	总就业数量 (人)	职业流动率 (%)
整体流动率	1599	10175	15.71	2980	3331	89.46
性别						
男	793	5648	14.04	2054	1905	107.82
女	806	4527	17.80	926	1426	64.94
企业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	225	3454	6.51	201	243	82.72
非国有企业	951	3307	28.76	2774	3078	90.12
职业性质						
固定工作	402	7291	5.51	174	178	97.75
非固定工作	1116	2604	42.86	2797	3134	89.25
职业种类						
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	106	477	22.22	1447	1756	82.40
技术人员	200	2147	9.32	203	133	152.63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90	1065	8.45	23	16	143.75
办事人员	289	2060	14.03	64	80	80.00
工人	352	2886	12.20	286	227	125.99
商业服务人员	458	1254	36.52	752	898	83.74
其他	84	237	35.44	205	221	92.76
年龄						
25 岁以下	171	709	24.12	296	427	69.32
26 ~ 35 岁	484	2316	20.90	1511	1504	100.47
36 ~ 40 岁	349	2026	17.23	687	740	92.84
40 岁以上	595	5124	11.61	486	660	73.64
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0	23	0.00	235	332	70.78
小学	46	272	16.91	435	527	82.54
初中	402	2390	16.82	1661	1810	91.77
高中	521	2853	18.26	456	468	97.44
中专	174	1281	13.58	105	114	92.11
大学	452	3352	13.48	88	78	112.82

再从分职业的情况分析，无论哪种职业，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都要高于城镇居民。相对来说，农民工最为稳定的职业是办事员，而城镇居民最为稳定的职业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城镇居民流动性最大的职业是商业服务人员和其他职业，而农民工在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工人等职业方面的流动率均超过了 100%，流动较为频繁。

在年龄方面，城镇居民的流动率是一条向下的曲线，即随着年龄增长，其职业流动率逐渐下降。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却出现不规则波动，职业流动率在 26~35 岁达到最大，而且农民工在 40 岁以上的流动率依然居高不下。这表明城镇居民在这个年龄段的流动性达到最低点，但该年龄段的农民工依然处在为生计四处奔波的境地。

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其职业流动率也很不一样。大学水平的城镇居民职业流动率最低。相比之下，农民工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学历越高流动性越大的特点，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职业流动率也逐渐升高，高学历的农民工职业流动性要普遍高于低学历的农民工。

### 三、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及其对收入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群体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我们以劳动者的职业流动频率为因变量，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T = \beta X + \mu \quad (1)$$

其中， $T$  为劳动者的职业流动频率； $X$  为与劳动者流动相关的一系列自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年龄、性别、本单位工作时间和其他单位时间； $\mu$  为误差项； $\beta$  为衡量自变量影响力的系数。对方程（1）进行线性回归，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结果发现，教育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具有相反的作用，对于教育水平高的城镇居民来说，其流动性反而较小。而对农民工来说，教育程度越高，流动性也越高。

年龄和本单位工作时间对于两个群体职业流动的作用均具有负面影响，但对农民工的影响要稍大些。性别对于两个群体的职业流动则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如果是男性的话，对城镇居民的流动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农民工则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其他单位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的流动也有较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在不断的流动中能够掌握更为充分的就业信息，因而更愿意去寻找合适的职业岗位。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除了流动比率居高不下之外，各种职业的流动性也和城镇居民差异很大。特别是在我们通常认为的白领职业中，农民工的流动也异乎寻常地频繁。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造成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繁的原因，除因为个人特征如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工龄以及职业的所有制类型等因素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无法用个人特征差异来解释的部分，也即歧视性部分的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 BOC 模型（Blinder-Oaxaca-Cotton）来进行分析。BOC 模型的表述如下：

$$\Delta \bar{T} = \bar{T}_R - \bar{T}_U = \alpha_R + \beta_R \bar{X}_R - \alpha_U - \beta_U \bar{X}_U \quad (2)$$

或者：

$$\Delta \bar{T} = \alpha_R - \alpha_U + (\beta_R - \beta_U) \bar{X}_R + \beta_U (\bar{X}_R - \bar{X}_U) \quad (3)$$

式中， $T$  代表劳动者的工作转换率；下标  $R$  代表农民工；下标  $U$  代表城市居民； $X$  代表个人特征向量的平均值； $\alpha$ 、 $\beta$  分别表示职业流动率影响因素方程中的常数项和各影响因素的系数。在方程（3）对职业流动率差异的分解式中，最后一项可以看做由于劳动者个人特征因素带来的差异，前面三项可以看作由于不可解释因素带来的差异。根据 BOC 模型的因素分解法，我们可

表 3 劳动者个人特征对其职业流动率的影响对比

自变量		城镇居民	农民工
教育	系数	-0.0056 ***	0.0048
	$t$	-2.82	0.42
年龄	系数	-0.0037 ***	-0.0098 ***
	$t$	-3.16	-2.68
性别（男性）	系数	0.0110	0.2903 ***
	$t$	0.97	4.71
本单位工作时间	系数	-0.0109 ***	-0.0274 ***
	$t$	-9.45	-3.71
其他单位工作时间	系数	0.0135 ***	0.2135 ***
	$t$	11.15	26.29
截距	系数	0.4708 ***	0.7327 ***
	$t$	11.44	4.71
样本量		10096	3310
Adj R-squared		0.1148	0.2049

注：\*\*\*代表在 1% 水平上显著。

以将两个群体的职业流动率差异进行分解（见表4）。

这个分解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流动率要比城镇居民高出73.75个百分点。这其中，可以由个人特征差异解释的部分为9.87个百分点，仅占可以解释全部差异的13.38%；其他不可由个人特征解释的部分有63.88个百分点，占全部差异的86.63%。这些不可解释的部分，我们大致可以归为是歧视性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形成的对农民工权益的损害，各种人为的阻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规章、制度，以及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就说明，正是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对农民工的种种歧视性因素，才加剧了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非正常的频繁。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另一方面是，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职业流动对其收入水平有着什么样的影响。采用（1）式的同样方法，只是在这里 $Y$ 表示农民工的收入（小时工资）； $X$ 为与劳动者流动相关的职业转换率，包括常数项； $\mu$ 为误差项； $\beta$ 为衡量自变量影响力的系数，也即流动收益率。进行线性回归后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职业流动率差异因素分解

项目	数值
农民工职业流动率	0.8946
城镇居民职业流动率	0.1571
差异总量	0.7375
不可解释的差异	0.6388
不可解释因素占比（%）	86.62
个人特征造成的差异	0.0987
个人特征因素占比（%）	13.38

表5 农民工职业流动与收入的回归结果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整体情况	系数	0.0864	办事人员	系数	-0.0917
	$t$	2.16		$t$	-0.41
	截距	3.0714		截距	3.8277
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主	$t$	36.69	$t$	11.01	
	系数	0.0852	工人	系数	0.0720
	$t$	1.14		$t$	0.69
截距	3.2377	截距		3.8794	
技术人员	$t$	22.5	$t$	15.31	
	系数	-0.0013	商业服务人员	系数	0.1080
	$t$	-0.02		$t$	2.52
截距	4.0817	截距		2.4173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t$	15.03	$t$	33.57	
	系数	-0.0657	其他	系数	0.2802
	$t$	-0.11		$t$	1.92
截距	5.9180	截距		2.4136	
$t$	3.21	$t$	9.02		

总的来看，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收益率为8.64%。其中，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其他职业的蓝领劳动者在所有职业中的系数均为正数；而白领职业中，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等职业的系数均为负数。这说明，蓝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收益率要显著地高于白领劳动者。

####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CHIP 2002年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职业流动方面的差异。和大多数的观察一样，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要比城镇职工频繁得多。这其中，首先是因为农民工个人因素与城镇职工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反映出农民工作为流入城镇新生劳动力的明显特征，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在进城之前人力资本方面的缺乏，也即缪尔达尔所谓的“前劳动力市场歧视”。

（下转第46页）

7%。接下来的仿真以外来人口参保率作为关键参数，观察该参数的调整目标以及调整路径对于城镇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并定量计算出了提高调整目标与加快调整速度的临界边际成本，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 [ 1 ] 谈佳隆. 上海社保基金入不敷出, 去年市财政托底 170 亿 [N]. 中国经济周刊, 2009-02-23.
- [ 2 ] 李伯华, 宋月萍, 齐嘉楠, 唐丹, 覃民. 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基于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 [J]. 人口研究, 2010, (1).
- [ 3 ] 任远. 谁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了下来? ——对城市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及居留模式的分析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 (4).
- [ 4 ] 原新, 韩靓. 多重分割视角下外来人口就业与收入歧视分析 [J]. 人口研究, 2009, (1).
- [ 5 ] 同 [2].
- [ 6 ] 任远.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3).
- [ 7 ] 高慧, 周海旺. 中国城市外来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对比研究——以上海为例 [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7, (4).
- [ 8 ] 米红, 周伟, 史文钊. 人口迁移重力模型的修正及其应用 [J]. 人口研究, 2009, (4).
- [ 9 ] 同 [8].
- [ 10 ] 龚秀全, 韩宇翔, 宋莉君等. 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参加综合保险意愿调查 [J]. 人口与经济, 2004, (4).
- [ 11 ] 谢勇, 李放.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意愿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J]. 人口研究, 2009, (3).

[责任编辑 肖周燕]

—————  
(上接第 32 页)

不过，除了可以观察到的个人特征导致了农民工的高职业流动率之外，在与城镇职工职业流动的全部差异中，尚有高达 86.63% 的部分不能由个人特征来解释。我们一般将其归类于歧视性的因素。而这些歧视性的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偏见”，按照贝克尔的说法，就是一类群体（比如雇主）对另一类群体（比如农民工）感到“身心不悦”<sup>[9]</sup>，使得被歧视群体被迫频繁辞职。另一类是制度性歧视，即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或地域上的排斥，致使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增多。此外，与许多研究结论不同，本文证明了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但职业流动的好处似乎只是对蓝领农民工有益，而对白领农民工却无益，甚至可能由于流动频繁而降低他们的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农民工“钟摆式”、“候鸟式”的就业模式已有了较大的改观。但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繁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也说明以户籍制度为主要根源的劳动力市场歧视现象远未消除。另外需要提醒的是，虽然说职业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但这种工资水平的提高究竟是因为更换职业而获得的结果，还是因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劳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所带来的客观效应，依然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观察的问题。

参考文献：

- [ 1 ] Blumen I., Kogan M., McCarthy P. The Industrial Mobility of Labor as a Probability Process [M]. Cornell Univ. Press, Ithaca, 1955.
- [ 2 ] Black, Dan H. Discrimination Equilibrium Search Model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5, 13 (2).
- [ 3 ] Bergmann B. The Effect on Income of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1. 79.
- [ 4 ] Doeringer P. B., Piore M. J. 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 [M]. Lexington: Heath, 1971.
- [ 5 ]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 6 ] 林坚, 葛晓巍. 我国农民的职业流动及择业期望 [J]. 浙江大学学报, 2007, (2).
- [ 7 ] 田艳平, 杨云彦. 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J]. 西北人口, 2006, (5).
- [ 8 ] 麦克南, 布鲁, 麦克非逊. 当代劳动经济学 (第七版) [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
- [ 9 ] Becker Gary S.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M]. 2<sup>nd</sup>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责任编辑 童玉芬]